

《比丘尼傳》之研究——以修行內容為主

釋法安

一、前言

《比丘尼傳》是唯一入藏的比丘尼傳記，記載自東晉以降正傳六十五位、附傳三十一位比丘尼的傳記，他的價值在於可以一窺東晉至梁代，部分比丘尼從出家、受戒、習經律論、習禪，乃至弘法與參政的情形，同時中土建立比丘尼僧團，也是始自東晉淨檢¹，若欲建構中土比丘尼史，《比丘尼傳》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資料。

本篇論文以比丘尼的修行內容作為論文的研究主軸，第一章前言，包括動機、相關研究成果分析、本論文研究方向等等；第二章為《比丘尼傳》作者與成書情形；第三章為比丘尼的戒行，包括受聲聞戒與菩薩戒相關議題討論、蔬食、懺悔等；第四章定行，包括習禪的時代背景、師承、習禪絕穀現象、燃身、誦經、禪齋等；第五章慧行，包括學習佛典的時代背景、對象、內容、弘法對象等等；第六章結論。將這些主題放在東晉、南朝的時空脈絡中論述。寫作立場方面，由於《比丘尼傳》是一部女性的僧人傳記，近來國外學者也有以女性主義的角度研究比丘尼相關主題，筆者將不站在女性主義的角度，也沒有宗派立場，採研究歷史文獻的立場，希望能客觀呈現東晉、南朝比丘尼的修行概況。

二、關於《比丘尼傳》的作者

從唐智昇《開元釋教錄》及唐以降史志記載《比丘尼傳》作者為寶唱的史料看來，雖然有學者提出《比丘尼傳》與寶唱另一僧傳《名僧傳》（現僅存《名僧傳抄》）的結構有多處相異之處，而懷疑《比丘尼傳》的作者可能並非寶唱，但在尚未有確鑿的文獻史料推翻經錄、史書紀錄之前，筆者暫依傳統看法，《比丘尼傳》的作者為寶唱。

三、傳記取材來源與特色

寶唱在序文明確提到傳記的取材來源有文獻資料的收集（博採碑頌、廣搜記集）和訪談，兩種方式。從傳文的文句、或與後代文獻比對，推測慧果、玄藻、法盛等等十四位比丘尼傳可能取材

自寺記、碑文、偈贊、行狀等等文獻資料，善妙比丘尼傳可能經由訪談。並從

重複的寺院名稱，推測寶唱可能參考不少寺志或寺院的相關文獻。另外，與王室、官員、貴族交遊的比丘尼人數，共佔全傳的百分之五十七，他們應是當時頗富名氣的比丘尼，這些比丘尼，住於王室官員所立的名寺，再者因本身的事蹟名聞為世人所知，所以寶唱要收集到這些人的生平事蹟或許並不困難。

在材料的特色方面，於東晉、南北朝時期，南北分裂的環境下，寶唱在取材上，除了卷一，六位出身里居位於北方，同時也住於北方的比丘尼，卷四，一位北方僞高昌都的比丘尼之外，其餘即便出身里居或祖籍於北方，但皆住於南方寺院的情況來看，顯然寶唱因地緣關係，取材上還是「重南輕北」的。另外，筆者在標明生卒年的時候也發現，齊、梁比丘尼的生卒年較東晉、劉宋詳細，顯現出越接近梁寶唱年代，寶唱所知越詳細等等文獻特色。

四、戒行舉隅

東晉、南北朝是佛教東傳中土、生根發展史上一個非常重要，也是非常特殊的一個時期，這時期有相當多印度、西域的僧人東來弘法、傳譯佛經，他們東來的貢獻，除了將佛法傳入中土，並在傳譯佛法的過程中，提供中土僧人直接向他們請益佛法的機會之外，從女性修行者的角度而言，更重要的是協助建立中土比丘尼僧團。

「比丘尼」身分的取得，相較於「比丘」，

在程序上是繁複許多，本文在「受比丘尼戒的情形」章節上，花了不少的篇幅陳述，主要是因為中土女性出家者淨檢等人，取得「比丘尼」身分的過程，幾經波折，而且《比丘尼傳》中，跟受戒相關的傳記，佔有相當的篇幅，再者，因為前人的研究成果，沒有辦法說明淨檢等人受戒不如法的客觀環境因素（包括廣律未傳來，對比丘尼戒了解不全，及無比丘尼戒師等），還有跟戒律相關的議題，如「一部僧得戒與否」、「未二歲學戒」、「邊地」等等需要根據廣律進一步說明。所以，依時間脈絡為主軸，企圖站在歷史演進、外國僧人傳來律典先後次序及外國僧人解釋戒律的立場，論述中土女性取得「比丘尼」身份的過程，及其面臨的問題。

在南傳及西藏佛教比丘尼僧團傳承斷絕的今日，《比丘尼傳》關於中土比丘尼僧團建立過程的資料，彌足珍貴，除了留下中土比丘尼僧團成立的歷史記載之外，也提供南傳、西藏女性出家者，再次建立比丘尼僧團的重要參考文獻。

而東晉淨檢等人，取得「比丘尼」身分的過程，幾經波折的主要原因，除了淨檢所處的時空，沒有具格的比丘尼戒師之外，還包括了對戒律了解不全。佛法傳來的情形是零散、毫無次序、無系統的，並不是依修學佛法的次第「戒、定、慧」而來，如第一位來中土傳譯佛法的僧人安世高，譯出《安般守意經》、《陰持入經》、《修行道地經》等經，不見有律，爾後支讖譯《道行般若經》、《首楞嚴經》、《般舟三昧經》等經，安玄、康僧會等人也不見譯律，直到曹魏·中天竺曇柯迦羅至洛陽（249-253）才譯出《僧祇戒心》，屬於大眾部的戒經，曹魏·安息國沙門曇摩羅至洛陽（254-255）譯出《曇無德羯摩》，屬於上座法藏部的羯摩本。所以中土的出家行者，不論男眾或女眾，一開始並非學律，而是先接觸經典，對於戒律全面的了解，至少要到姚秦弘始七年（405），上座說一切有部律《十誦律》傳來之後，也就是淨檢（300-370）往生三十五年後，中土比丘尼才能全面了解戒律的全貌。所幸淨檢當時所遇的外國比丘曇摩羅多，以佛姨母大愛道僅依比丘僧受戒為例，授予淨檢等人比丘尼戒，才使中土比丘尼僧團得以建立。

中土的比丘尼僧團是在外國僧人的協助下成立的，並且在過程中與中土比丘釋道場、慧義等人，非難、質疑的態度相較，形成強烈對比，筆者在撰寫這段論文中深切體

會到佛法「師承」的重要，畢竟佛法來自印度，不論傳承戒律或理解佛法、建立正見，乃至學習禪法，都有向印度僧人學習、請教的必要。

這些比丘尼在取得合格的身分後，跟隨法穎等中土研律僧人學習戒律，在戒行有虧的時候，也能依聲聞律規定，在每半月布薩誦戒時，大眾僧前發露懺悔的方式，或者依大乘教典「觀相懺悔」（依經懺悔至見瑞相為止）、「作法懺悔」（稱佛名、禮拜等）的方式懺悔。傳中比丘尼懺悔的方式，以依大乘教典的懺悔方式為多，其因可能有二，其一是聲聞律「每半月布薩誦戒時，大眾僧前發露懺悔」的方式，是在僧團中舉行，《比丘尼傳》所記的是個別修行的情形，對於僧團內部的運作很難找到相關資料一一詳述，其二是東晉、南北朝時期是大量大乘經典譯出的時代，大乘經典中提到「稱佛名、禮拜、發願、迴向」等「作法懺悔」的經文比比皆是，而且中土不論僧人或一般人對大乘經典的接受度都相當高，所以大乘經典的懺悔方式為此時期重要的行門之一。

五、定行舉隅

在今日要找尋比丘尼習禪的資料，除了在禪宗的典籍可見之外，《比丘尼傳》也可以找到不少，《比丘尼傳》正傳六十五人中，共有多達二十二位比丘尼習禪，可見東晉、南朝比丘尼習禪的風氣頗為興盛。並從傳文「禪思靜默、通達三昧」或「深禪妙觀、洞其幽微」，「每至入定輒移昏曉，綿神淨境，形若枯木」，「堅如木石，牽持不動」的描述，可以略知其禪定的功夫。其次，在習禪的對象方面，可惜只有八位比丘尼的傳記提及，他們向外國禪師習禪，如曇良耶舍，還向中土專精禪法的比丘、比丘尼習禪，如玄暢禪師、隱、審二禪師、草堂寺思隱、靈根寺法穎及比丘尼慧緒、法育、江陵不知其名的隱尼等。並且在修定之餘教授禪法，如廣陵中寺光靜比丘尼，隨其學觀行者，常百人許；禪基寺僧蓋比丘尼，道俗諮訪禪觀；集善寺慧緒比丘尼，豫章王妃及內眷屬，從受禪法；禪林寺僧念，大弘禪觀，諸學者眾。

南朝比丘尼習禪人數不少，其實是客觀環境所使然。南北朝時期是翻譯經典的一個高峰期，部分譯經的外國法師也是禪師，也有罽賓、西域禪師至中土遊方弘化。一般認為菩提達摩來中土之前，中土禪法可分為三大系，分別是鳩摩羅什的般若系禪法、佛陀

跋陀羅的聲聞禪法、佛陀扇多所傳罽賓禪法，這樣的說法或許過於籠統，無法反應南北朝禪法流傳的情形，實際上根據梁僧祐《出三藏記集》、梁慧皎《高僧傳》、梁寶唱《名僧傳》等文獻，南北朝時期來中土「傳禪法的禪師」不少，應不只此三系。

東晉時期除了鳩摩羅什、佛陀跋陀羅之外，另有曇摩耶舍，罽賓人，年十四為弗若多羅所知，長而氣幹高爽，雅有神慧，該覽經律，明悟出群，陶思八禪，遊心七覺，偽秦弘始九年之後（407以後，東晉安帝時期 397-418），耶舍後南遊江陵，止于辛寺，大弘禪法。

劉宋、南齊時期除了西域禪師曇良耶舍之外，另有曇良耶舍附傳所記天竺沙門僧伽達多、僧伽羅多等，並禪學深明，來遊宋境，達多元嘉十八年夏受臨川康王請於廣陵結居，羅多宋景平之未來至京；曇摩密多，罽賓人，博貫群經，特深禪法，世稱連眉禪師，至涼州、蜀、荊州弘禪，後至京師譯出禪經，並常以禪道教授四輩，因此遠近皆號大禪師。而通達禪、律的譯經師罽賓佛馱什、中天竺曇無讖至中土譯經、律，可惜從其僧傳內容無法得知其二人，是否傳禪法。

劉宋時期弘禪之中土禪師，根據梁慧皎《高僧傳》，筆者擇傳記中記載其師承、並弘禪者二人，一為玄高，師承於浮馱跋陀禪師，後於北方弘禪，二為釋慧覽，師承於罽賓從達摩比丘，後於南方京邑弘禪。

梁寶唱《名僧傳》中有外國禪師篇共十人，除了曇摩耶舍、曇摩密多、佛陀跋陀羅、曇良耶舍與梁僧祐《出三藏記集》、梁慧皎《高僧傳》重複之外，另記「晉長安大寺弗若多羅、晉西海跋摩瞿沙、宋西梁洲智山、宋高昌摩騰据帝、宋建康僧伽達多、宋宗熙寺僧伽羅多哆」六位外國禪師，雖詳細傳記已不存，但仍提供有不少外國禪師在東晉、劉宋時期至中土傳禪法的訊息，相當珍貴。

如上述，外國禪師與中土禪師宏禪的南北朝時期，提供了南朝比丘尼習禪的背景，在禪法流傳的時代，當然習禪風氣就興盛，一般史學家認為南方重義學，北方重禪學，實際上從僧傳記載西域、罽賓、天竺禪師東來至南方弘禪的文獻看來，南北朝時期南方習禪風氣也是相當興盛。

六、慧行舉隅

《比丘尼傳》中提及比丘尼們在慧學方面的學習更是積極，他們處在東晉、南北朝，佛典大量傳來的時期，不僅研究材料豐富，講經的活動更由於王室、貴族的資助，講集處處，另外，也親近義解僧人慧解佛典，在環境的耳濡目染及個人的努力下，有不少比丘尼也能講說佛典，並受到帝王的注意而受邀講經，甚至因與王室貴族從往過密而有參與政事的情形出現。

七、結語

考察佛世時，出家弟子大約可以分為兩類，一類為「阿蘭若比丘」，這類的僧人專修苦行，好靜而獨住阿蘭若（寂靜處），過著隱遁清苦的獨善生活，專修定慧，且深怕世事擾亂他們的生活，有些甚至不願為人說法，釋尊的時代，由於厭世、苦行的風氣非常濃厚，所以隨佛出家的弟子，阿蘭若比丘、比丘尼不少；另一類為「人間比丘」，這類僧人的生活，不過分刻苦，常遊化人間，並過著和樂共住的大眾集團的生活²。而中土的僧人，由於不乞食托鉢，多數是如「人間比丘」一般，過集體的僧團生活，也在自行修道之餘弘化一方，在《比丘尼傳》中，處處可見這類僧人。在東晉、南北朝時期，不少比丘尼寺甚至是王室、貴族的大力資助下才得以建立發展起來的，其中除了卷一妙音比丘尼因與王室、貴族來往過密而有干預朝政的事件發生，惹人非議之外，其他《比丘尼傳》中的比丘尼，皆是在戒定慧上解行並進的僧人，他們不論德行或修道事蹟皆足為後世表率，所以《比丘尼傳》堪稱是東晉南北朝的一部《高尼傳》。

¹根據唐·道世《法苑珠林》〈齊尚統師〉的傳記提到，在漢末魏初，即有中土女性行者受比丘尼戒成為具戒比丘尼，且從文獻推測當時有大僧、又有東竺國十位具格比丘尼戒師的情況，應是採二部僧受戒。另外，唐法琳《辯正論》、唐道宣《釋家方志》等等文獻均記「西晉二京有『僧尼』三千七百餘人。」所以，筆者傾向認為淨檢之前，就有女性出家行者受戒成為比丘尼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只是從學術的角度，孤證的說服力較弱，但筆者仍舊在此提出，待日後更進一步的文獻加以佐證，東晉之前是否有比丘尼的疑問。

²參《佛在人間》，印順著，正聞出版社，1987，頁 56-57。